Song Dynasty

The Dawn of Modern China

宋

近代中國的黎明

吳鈞◎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錄

009 自序　一個站在近代門檻上的王朝

瓦舍勾欄

035 瓦舍勾欄　酒樓　茶坊　飯店

048 鋪席　大相國寺　小商販　運河

057 青樓歌妓　夜生活

063 旅遊　踏春　地圖　客邸　動物園與公園

077 關撲　貴族運動　蹴鞠　相撲　玩具　遊戲

093 節假日　元宵花燈

099 相親　怕老婆　服飾　愛美　香熏

112 唱歌　鮮花　沐浴　刷牙　寵物

123 美食　蔬菜　飲料　果子

132 保暖與消暑　燃煤　火柴

138 住房　坐具　出行

147 家政服務　天氣預報

152 人情高誼　幸福生活

契約時代

161 人口　城市人口　城市化　發現城市

168 城市面貌　城建拆遷　市民社會

176 城市治安　消防　環衛　地下水道　自來水　環保

192 平民社會　官二代　契約化①　契約化②　平等

206 流動性①　流動性②

212 貧困救濟　福利體系①　福利體系②　福利體系③　福利體系④

224 婚姻不問閥閱　奩產　和離　改嫁　纏足　重女輕男

238 教育　科技高峰期　軍事科技　題壁詩

250 花押　結社　社會信任　重建宗族　呂氏鄉約　朱子社倉　書院

270 士紳　自治

276 民風好訟　民告官　硬氣　藝人諷政

288 對外開放

全民皆商

295　商人地位　全民皆商　思想的突破　消費主義　保富論　大商人　塌房

314　廣告　商標

321　小報　書坊　知識產權　文化市場

332　信託　信託機構　商業中介　稅務代理

340　商業信用　遠期合同　證券交易所　金融銀行業

352　國際貨幣　紙幣　紙幣理論

361　原始工業化①　原始工業化②　科技的應用①　科技的應用②

371　經濟作物　市場化　政府購買　招標投標　賑災的市場機制

387　重商主義　物價信息　海外貿易　經濟制裁

401　物權　債權　交易合同　時效

412　高收入+高消費　富庶　財稅

共治天下

427 公天下　大憲章　祖宗法　馴服皇權

439 虛君　實相　台諫　封駁權　共治

455 地方權力結構　責任政府　文官制

462 道理最大　公開性　公議　法治

474 朋黨　左右派　黨爭

485 政治寬容　罵皇帝　士臣氣性

495 審計　GDP考核　「公用錢」與「券食制」　官邸制　官不修衙

507 新聞發佈　平等外交　雇傭兵

517 立法民主化　司法專業化　司法考試　越訴

529 司法程序　鞫讞分司　錄問　判決　翻異別勘

542 迴避制　獨立審判　問責法官

550 訴訟證據　緩刑　人道主義　情·理·法　大法官

567 後記

570 本書參考文獻

自　序

一個站在近代門檻上的王朝

一

研究宋史的張邦煒教授曾經感慨：「從前人們往往一提到漢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講到宋代，就貶就抑：積貧積弱。」其實何止是「從前」，直至今日，在許多人的印象中，宋朝仍然被當成一個窩囊的王朝。然而，日本與歐美的漢學家對宋代卻不吝於讚美，評價非常之高。美國多所高校採用的歷史教材《中國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其中有一章的內容宣稱「中國最偉大的朝代是北宋和南宋」（China's Greatest Age: Northern Sung and Southern Sung）。宋代武功遠不及漢唐之盛，卻何以大獲海外漢學家的青睞呢？中國人看待中國歷史，往往擺脫不了對國運的關注，因而影響到情感的取捨。而海外學者則能夠保以超然的心態去評估一個王朝的文明表現。正是從文明的角度，他們發現了宋朝的諸多了不起的成就。

許多海外漢學家在論及中國宋代的時候，似乎還特別喜歡使

用「革命」之說。比如英國漢學家伊懋可（Mark Elvin）認為，唐宋之際發生了一場「經濟革命」，包括農業革命、水運革命、貨幣和信貸革命、市場結構與都市化的革命和科學技術革命；日本學者斯波義信也提出「宋代經濟革命」說，並列舉了宋朝的農業革命、交通革命、商業革命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變遷；《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諾斯（Stavrianos）也說，「宋朝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對整個歐亞大陸有重大的意義。」美國學者郝若貝（Robert Hartwell）則認為宋代中國出現了「煤鐵革命」。彷彿不用「革命」一詞，不足以強調宋代文明與之前時代的深刻差異。

大概正因為看到了唐宋之際發生的種種「革命性」變遷，又有許多漢學家相信，唐代是中世紀的黃昏，而宋朝則是「現代的拂曉時辰」。

自從日本的歷史學家內藤湖南在 19 世紀末率先提出「唐宋變革論」（唐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宋代則是中國近代的開始）以來，宋代的近代化色彩便一直是海外漢學家講述宋朝歷史的最重要母題——

內藤湖南的弟子、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宮崎市定稱：「中國宋代實現了社會經濟的躍進、都市的發達、知識的普及，與歐洲文藝復興現象比較，應該理解為並行和等值的發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東方的文藝復興時代』」，「宋代社會可以看到顯著的資本主義傾向，呈現了與中世社會的明顯差異」。

另一名日本學者藪內清也說：「北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代。……在這個文化發達的歷史潮流中，有許多驚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認為，北宋時代可以和歐洲的文藝復興時

期以至近代相比。」

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說道：「十三世紀的中國，其現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驚的：它獨特的貨幣經濟、紙鈔、流通票據，高度發展的茶、鹽企業，對外貿易的重要（絲綢、瓷器），各地出產的專業化，等等。國家掌握了許多貨物的買賣，經由專賣制度和間接稅，獲得了國庫的主要收入。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藝術、娛樂、制度、工藝技術各方面，中國是當時世界首屈一指的國家，其自豪足以認為世界其他各地皆為『化外之邦』。」

另一位法國漢學家白樂日（Etienne Balazs）也提出：「中國封建社會的特徵，到宋代已發育成熟；而近代中國的新因素，到宋代已顯著呈現。因此，研究宋史，將有助於解決中國近代開端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在中國知識圈很著名的美國漢學家、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認為，宋代「包括了許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徵，所以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視其為『近代早期』」。

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黃仁宇更是乾脆地宣稱：「公元960年，宋代興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貨幣之流通，較前普及。火藥之發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針、天文時鐘、鼓風爐、水力紡織機、船隻使用水密隔艙等，都於宋代出現。在11、12世紀內，中國大城市裡的生活程度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較而無遜色。」

另一位美籍華人學者、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也稱：「吾人如大膽地說一句，北宋的朝政，是近古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起步，亦不為過。可惜的是，傳統中國這種有高度現代化和民主意味的開明文官制，在宋亡之後，就再次復古回潮了。」

美國孟菲斯大學教授孫隆基則說道：「在我們探討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標準，例如：市場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達、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與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國家的成形以及國際化等等。這一組因素，宋代的中國似乎全部齊備，並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總而言之，在海外漢學界，「宋代近世說」顯然要比「晚明資本主義萌芽論」更有說服力，更可能達成共識。

二

當然，我們不能因為海外漢學家說宋代是近代開端，便不假思索地附和。宋朝到底是不是邁入了近代的門檻呢？我們不妨列出近代化的衡量標準，來跟宋代社會對照一下。

當一個社會從中世紀進入近代，總是會出現某些共同的趨勢與特徵，我們試列舉如下：

商業化。商業漸次繁華，商品經濟逐漸取代自然經濟。

市場化。隨著商品經濟的展開，市場取代行政命令，成為配置資源的重要機制。

貨幣化。市場經濟的發展，不但使得貨幣成為市場交易的結算工具，而且國民的賦稅與勞役、國家的行政動員，也可以用貨幣結算，達成黃仁宇先生所說的「數目字管理」。

城市化。越來越多的人口脫離農村和土地，進入城市謀生，成為城市的居民。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大。

工業化。手工業發達，出現了以市場交換為生產目的、以手工業坊場為生產形態的手工業。

契約化。英國歷史學家梅因（Maine）說：「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為止，都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從中世邁向近代化的核心標誌之一，便是出現了從「人身依附」向「契約關係」的轉型。

流動化。由於人身依附弱化乃至消失，一個近代化的社會必然出現越來越明顯的流動性，包括地域之間的流動、階層之間的流動。

平民化。世襲的貴族作為一個特權階層，日漸式微，平民階層的影響力日益上升，世俗化的市民文化蓬勃生長，最終形成一個平民社會。

平等化。貴族式微，平民崛起的結果，是人與人之間基於不同出身的地位懸殊被抹平，階層之間的森嚴壁壘被打破。

功利化。由於商品經濟的滲透、社會風氣的世俗化演變，一個近代化的社會總是會產生出明顯的功利主義思潮。

福利化。近代歐洲的經驗表明，當一個社會開始了商業化、城市化、流動化的轉型，必然將誕生一個龐大的貧民階層，原來由宗教團體提供的救濟體系已經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必須由強有力的國家財政負擔起救濟的責任。

擴張化。這裡的擴張化是指國家經濟職能的擴張。一些自由主義者認為，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機制可以自發地推動並構建出一個近代化的經濟體系。但這從來只是假想，而非事實。事實是，近代化的啟動，總是以國家的重商主義為先導，政府設立的經濟部門出現明顯的擴張，如此，才能為市場的擴張奠定基礎。

集權化。國家的權力結構從貴族封建制轉化為王權制。有學者指出：「無論是遲是早，幾乎所有國家都必須在經歷了專制王

權這個階段之後，才能跨入近代世界的大門。未完成由封建制度向專制制度的轉變，意味著未能進入近代政治的起點，從而意味著國家在近代化第一階段的完全失敗。」這裡的「專制」一詞如果換成「王權制」，會更準確。

文官化（理性化）。隨著王權制的確立，貴族的政治權力逐漸被一個科層化的文官體系所接替。在韋伯看來，文官制與理性化幾乎是一個同義詞，文官制的建立，預示著國家治理的理性化，即政治權力的分配與行使由明確的程序與制度來規範，從而擺脫了私人意志與情感的干擾。

法治化。近代化的漸次展開，塑造出一個複雜化的陌生人社會，以及一個龐雜的治理體系，熟人關係、習俗與道德已不足以應對這種複雜性，因此，國家需要創制出更加繁複的法律，以適應時代的嬗變。

那麼問題就在於：這些涉及經濟變遷、社會轉型與政治構建的近代化指標，在宋朝一齊出現了嗎？是的，它們一齊出現了。

三

宋代是繼漢初之後的又一個商業繁華期，商業化的浪潮席捲了整個宋朝國境，「貨殖之事益急，商賈之事益重」。一位宋朝人看到，「人家有錢本，多是停塌、解質，舟舡往來興販，豈肯閒著錢買金在家頓放？」宋朝人家有了閒錢，即拿出來投資。一些漢學家甚至提出，宋代「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

既然稱之為「商業革命」，當然需要有革命性的經濟表現。宋代在經濟上確實出現了革命性的變遷：

——「田制不立」，即國家承認完整的私有產權（中唐之前實行均田制，產權的自由交易是受到限制的）。

——農業生產力獲得革命性的提高，特別是水稻早熟品種的引進與復耕技術的推廣，讓同樣面積的土地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如是，才可能從土地中析出更多的賦餘人口與農產品，流入城市與工商業。

——原來束縛了商業自由的坊市制在宋代徹底瓦解，街市制開始形成，「自大街至諸小巷，大小鋪席連門俱是，即無空虛之屋，每日凌晨，兩街巷門上行百市，買賣熱鬧」。在宋代之前，這是不可想像的。

——海外貿易高度繁華，當時整個大宋國的海岸線，北至膠州灣，中經杭州灣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廣州灣，再到瓊州海峽，都對外開放，與西洋南洋諸國發展商貿。市舶司（海關）每年從海上貿易中抽稅近 200 萬貫（明代在「隆慶開關」後，海關抽解每年不過區區幾萬兩銀），進出口貿易總額超過 2,000 萬貫。

——商業信用非常發達，從北宋到南宋，陸續出現了便錢（類似於銀行匯票）、現錢公據（類似於現金支票）、茶引、鹽引、香藥引、礬引（類似於有價證券）、交子與會子（法幣）等商業信用。如果沒有發達的商業信用，大宗的或者跨區域的市場交易是不可能達成的。

——商業化的深入，表現在國家財稅結構上，即農業稅的比重下降，商業稅的比重上升，南宋淳熙至紹熙年間，來自非農業稅的財政收入接近 85%，農業稅變得微不足道。這是此前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事情，要到了 19 世紀的晚清，洋務運動之

後，清政府的田賦比重才下降至 48%。

宋代商業化的展開，也是市場化不斷深化的過程。市場化不但表現為民間的衣食住行均可以通過市場解決，宋代江南一帶的許多農户，基本上已經不再種田，「糊口之物，盡仰商販」；而且，國家也放棄了行政命令這種方式，而採用市場機制獲取政府的消費品、調撥公用物資，甚至使用經濟制裁的威懾來維持與鄰國的和平。

貨幣化的趨勢在宋朝也非常明顯。宋政府每一年都要鑄造巨量的貨幣來滿足民間交易，北宋的最高年鑄幣量則達到 570 萬貫，平常年份都維持在 100 萬貫至 300 萬貫之間；明代近 300 年的鑄幣總量，宋人用兩年時間便鑄造出來了。

為甚麼宋人必須大量鑄造貨幣？因為需要滿足貨幣化的時代需求。不獨市場交易以貨幣結算（在自然經濟時代，還可以物易物）；官吏與雇工的酬勞，也要用貨幣支付，而在宋代之前，工資以實物為主，貨幣只佔其中一小部分；宋朝國家的稅收，也從以實物為主向以貨幣為主過渡，北宋治平二年（1065），宋政府貨幣性歲入的比重超過了 50%；王安石變法更將力役也折成貨幣結算，顯示出貨幣化已成大勢所趨。

宋代的城市化也有革命性的表現：城市人口的比重達至歷代最高峰。北宋的城市人口佔 20.1%，南宋時達到 22.4%。據斯波義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時期的城市化率可能達到 30%。而清代中葉（嘉慶年間）的城市化率約為 7%，民國時才升至 10% 左右，到 1957 年，城市化率也不過是 15.4%。一些研究者因此提出，宋代發生了一場「城市革命」。

還有一些歷史學者認為宋代出現了「原始工業化」。一個最

能體現宋代「原始工業化」的例子是鐵的產量：由於煤礦的規模化開採且應用於煉鐵，北宋的鐵產量表現出飛躍性的發展勢頭，而英國要到 16 世紀的工業化早期才產生類似的「煤鐵革命」。大量的科學技術也應用於手工業生產，英國劍橋大學的李約瑟博士稱：「中國的科技發展到宋朝，已呈巔峰狀態，在許多方面實際上已經超過了 18 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英國或歐洲的水平。」

四

上面我們從經濟變遷的角度描述了宋朝的近代化表現，接下來我們再從社會轉型的視角來觀察宋代——

唐宋之際，中國社會發生了一次非常深刻的大變遷：唐代有部曲，是世世代代為門閥世族耕種的農奴，沒有獨立户籍；唐代的奴婢也不具備獨立的法律人格，不獨立編户，是附依於主家的賤户；入宋之後，隨著門閥世族的瓦解，部曲與賤口都成為自由民。宋代的佃户與地主不再存在人身依附關係，只是結成經濟上的租佃關係，租佃關係基於雙方的自願結合，以契約為證。宋代奴婢與主家之間也不是人身依附關係，而是經濟意義上的雇傭關係，雇傭關係同樣基於雙方自願的契約。這樣一種結構性的社會變革，核心意義就是「契約化」——從「人身依附」向「契約關係」轉型。

這個契約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平等化的進程。不管是部曲，還是奴婢，在宋代之前都屬於賤民，而這些賤民到了宋代，都基本上消失了，或者說，從前的賤民現在已經獲得了自由民的身份，都成了國家的「編户齊民」，擁有平等的法律主體資格：「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

貴族的消亡，推演著一個平民化社會的來臨。宋代之前，政治幾乎為貴族壟斷，唐代雖有科舉制，但藉科舉晉身的平民官僚，寥寥可數。宋代情勢一變，取士不問世家，「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門第傳統的遺存」(錢穆語)。據學者對南宋寶祐四年（1256)《登科錄》的統計，在 601 名宋朝進士中，平民出身的有 417 名，官宦子弟有 184 名，寒門進士佔了絕大多數。

作為平民社會的表徵，宋代的教育、文化藝術等領域，也一齊出現了明顯的平民化色彩。宋代之前，貴族掌握著得天獨厚的教育資源，而宋朝的學校則向全民開放，包括「工商雜類」的子弟均可進入州縣學校讀書。文學、音樂、美術在宋代之前也是上層人玩的高雅品，進入宋代後，才產生了完全屬於平民（市民)的文學、音樂形式，如話本、滑稽戲等。我們從宋代之前的美術作品上也幾乎找不到任何平民的影子，只有展開宋人的畫作，如《踏歌圖》《清明上河圖》，那種平民氣息、市井氣息才會撲面而來。

同時，隨著人身依附狀態的解除，宋朝社會出現了廣泛、持續的流動性。這種流動化既包括地理意義上的橫向流動，即可以從一地自由遷徙到另一地；也包括階層意義上的縱向流動，即固化的等級結構被打破，任何人都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獲得上升的機會。

宋人發現，「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固不為患」。這裡的「近世」，當然是指宋代。用現代概念來說，宋人有了「自由遷徙」的權利。

宋人又發現，「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為四，起於後世」。這裡的「後世」，也是指宋代。「貧富貴賤，離而為四」的意思，是說從宋代開始，此四者可以自由組合：貧者可以富，可以貴；賤者可以貴，可以富；富者可能貴，也可能賤；貴者可能富，也可能貧；貧富貴賤處於變動之中。用現代社會學的概念來說，社會階層沒有「板結化」。社會也因此才煥發出活力。

整個社會的結構性轉換，以及商品經濟的深入展開，也讓宋朝的社會風氣出現巨大嬗變——人們不憚於言利，「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追逐財富成為理所當然之事。拜金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大行其道，這種功利化世態乃是資本主義時代來臨的一般社會景象，不管是兩宋、晚明，還是近代的西歐城市，莫不如此。

五

現在，我們從國家治理功能構建的角度再來觀察宋朝的近代化表現——

研究者發現，在 16 世紀的歐洲，當經濟結構從封建制度過渡至資本主義制度之際，出現了一個特徵，即由於經濟失調而產生大量都市貧民，近代歐洲國家逐漸發展出來的福利政策，就是為了應對這種結構性的經濟轉化。英國也是在近代化剛展開的 16 世紀下半葉發佈了一系列「濟貧法」，由政府負擔起救濟貧民的責任。中國的國家福利體系，也恰好在宋代發展至頂峰，這種「福利化」國家功能的出現並不是巧合，而是近代化產生的壓力

催生出來的結果。

宋朝的貧民救濟主要由兩個系統組成，一是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施行的「惠養乞丐法」：每年十月入冬後，各州政府「差官檢視內外老病貧乏不能自存者」，每人一日「給米豆一升，小兒半之」。宋人對「乞丐」的定義與今日不同，凡貧困人口，均納入乞丐範圍；一是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頒行的「居養法」：各州設立居養院，「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給米豆，疾病者仍給醫藥」。簡單地說，「惠養乞丐法」指由政府給貧民發放米錢；「居養法」則指由國家福利機構收留無處棲身的貧民。

為了應對近代化的挑戰，國家不僅要發展出福利功能，更需要深切介入經濟活動，包括徵稅、借款、投資、開拓市場、調控市場、制訂商業規則、維護市場秩序等，這便是重商主義下國家經濟職能的擴張化。宋朝無疑是歷代最具重商主義性格的一個王朝，政府設立非常多的經濟部門參與市場經濟，包括市舶司、鹽井監、樓店務（房地產公司）、酒務（釀酒廠）、麴院（製造酒麴的作坊）、造船務、紡織院、染院、磨坊（糧食加工廠）、茶磨（茶葉加工廠）等等，具有金融功能的經濟部門就有榷貨務、便錢務、交子務、市易務、檢校庫、抵當所等。

可以說，宋代的國家扮演了一個「超級商人」的角色，自由主義者可能會對此嗤之以鼻，但歷史地看，近代化的商業引擎，離不開以國家之力來啟動。一個對商業發展無動於衷、碌碌無為的政府，比如朱元璋建立的明政府，真的更有利於近代化的擴展嗎？

也許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國家重商政策對於資本主義之興起的重要性：宋朝在河北路與京東路實行食鹽自由通商制度，在其

他地方則推行鹽引制（國家間接專賣）。按道理說，食鹽的禁榷應該會妨礙民間商品經濟的發育，遲滯資本主義的產生，但學者的研究卻發現，在宋朝的食鹽自由貿易區，「生產技術並無任何進步與創新，生產規模也未見擴大，鹽商的資本增殖速度似乎並不快，見不到特富的大鹽商」。倒是在推行鹽引制的禁榷區，「能夠發現生產技術和工藝的明顯改進與革新，井鹽生產似乎還出現新的生產關係的萌芽，也能在實行鈔引制的東南鹽區見到發家致富的大鹽商」。

正因為近代化的啟動與展開離不開國家力量的支持，一國總是在完成了國家的集權化之後才有可能順利實現近代化，不管是先發近代化的歐洲大陸與英倫，還是後發近代化的日本，均表明了這一點。相比之下，中國的集權化完成得非常之早，秦朝建立郡縣制，即宣告王權制的來臨。早熟的集權化未必合乎歷史趨勢，因而中國在魏晉時期出現了貴族制的回潮，並在南北朝至隋唐時期形成門閥世族。經過唐宋變革，「君主獨裁」政治才完全確立下來。

需要提醒的是，我們這裡所說的「君主獨裁」，只是表示一種與貴族政治相對的政體，指政府機構被置於天子的直接指揮之下，而不是說君主不受約束，可以乾綱獨斷。恰恰相反，宋朝已經形成了一種「虛君共治」體制，君主「以制命為職」，但「一切以宰執熟議其可否」，即由宰相執掌具體的國家治理權；如果政令「有未當者」，則由「台諫劾舉之」，即台諫掌握著監察、審查之權，以制衡宰執的執政大權；執政、台諫，加上端拱在上的君主，三權相對獨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

中國的文官制也建立得早，與郡縣制的成立同步，但要到

宋代，文官制才發展出足夠的理性化。理性化是文官制的核心意義，即公務員的分類、職能、考試錄用、考核、獎懲、培訓、晉升、調動、解職，權力命令的發起、傳遞、審查、執行、反饋、問責，都有完備的制度與程序可遵循，從而最大限度隔離私人因素的影響。那些不欲受到約束的帝王，都會產生突破文官制的衝動，如西漢武帝啟用了一個由宦官、侍從、外戚、尚書（皇帝的私人秘書）等親信、近臣組成的「內朝」，將三公領導的「外朝」撇在一邊；明朝乾脆廢掉宰相，另立「內閣」，內閣實際上就是皇帝的秘書班子。唯獨宋朝三百餘年，沒有形成破壞文官制的「內朝」，文官制的運作非常穩定。

近代化的治理秩序還有一個特點：法治化。今人多以為「法治」是西方特產，中國的治理傳統是「人治」，但宋人並不這麼認為，宋人自稱「尚法令」。南宋的思想家陳亮與葉適總結說：「漢，任人者也；唐，人法並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無大小，一聽於法」。所謂「任法」「一聽於法」，套用現代的術語，就是「以法治國」的意思。

宋朝法制體系之繁密，可能要超出許多人的想像。宋人葉適這麼描述道：「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為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一個聰明人，窮盡一生的智慧，想出一項立法，自以為新奇，但查一下法律彙編，卻發現類似的法條早已制訂出來了。

這些繁密的法律包括民商事立法，宋朝的民商事立法非常完備，民間租賃、抵押、出典、買賣、借貸、財產繼承，均有周全的法令給予規範。宋人自己說，「官中條令，惟交易一事最為詳

備，蓋欲以杜爭端也」。發達的民商事立法讓一些研究者相信，宋代已經產生了「法學近代化」的跡象。

六

如果我們同意前文對近代化特徵的概括以及對宋朝近代化表現的描述，那麼我們應該承認，宋代中國確實已經邁入了近代的門檻。

請注意，這場發生在 11—13 世紀的近代化變革，毫無疑問，並非由西方輸入——此刻的西方還在漫長的中世紀沉睡——而是基於中國文明自身的積累與演進，基於中國歷史內在的發展動力而形成的，用陳寅恪先生的話來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文明的積累與演進如同一個沖積平原，歷史是長河，時光的河水流過，不捨晝夜，不斷留下前人的經驗與成果，慢慢地便堆積出一個豁然開朗的世界。

今天大多數的歷史學家都相信，大約在 11 世紀發生了一場「唐宋變革」：中國歷史從中世紀的黃昏轉入近代的拂曉時刻。不過，不管宋代與唐代之間看起來有多麼大的差異，宋朝的近代性同樣是前代文明沖積的結果，比如從唐代的「飛錢」孕育出宋代發達的商業信用，瓦解於宋代的坊市制在中晚唐已經出現鬆動，宋朝管理海外貿易的市舶司也是繼承自唐朝設施。「唐宋變革」並不是斷裂式的突變，而是內在於文明積累的突破。

文明積累的假說與唐宋變革的歷史事實，首先宣告了所謂的「中國歷史停滯論」的荒謬。從 18 世紀起，處於近代化進程中的西歐開始出現一種傲慢的論調：一些對中國了解非常有限的哲學

家根據他們的想像，對中國文明作出「停滯」的定性，如德國哲學家赫爾德稱：「拿歐洲人的標準來衡量，這個民族（中國人）在科學上建樹甚微，幾千年來，他們始終停滯不前。我們能不對此感到驚訝嗎？……這個帝國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塗有防腐香料，描畫有象形文字，並且以絲綢包裹起來。它體內血液循環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

諷刺的是，這類對中華文明的誣衊式論斷，居然獲得中國公知式人物的共鳴與讚賞。在中國網絡上，還流傳一句據稱是另一位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所說的名言：「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被無數網友奉為圭臬，一遍遍引用。

然而，如果赫爾德與黑格爾（假如黑格爾確實說過那句「名言」的話）對中國歷史的描述是準確的，那歷史上的「唐宋變革」該如何發生？從盛唐的中世紀色彩，到大宋的近代化性格，這中間的變革，比任何一次的王朝更迭都要深刻。如果這都能說是「始終停滯不前」，德國人才應該「對此感到驚訝」。相比之下，倒是中世紀的歐洲更像陷入了「停滯」。

當然，中西的歷史都不可能停滯，西歐歷史以他們的軌跡演進，中國歷史也以自己的軌跡演進，經過漫長的文明沖積，「造極於趙宋之世」，產生了近代化的大突破。——我們這樣的描述，也挑戰了費正清先生提出的「衝擊—回應」理論。

所謂「衝擊—回應」理論，簡單點說，即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只有在經歷 19 世紀來自西方的「衝擊」之後，產生了「回應」，才會出現近代化轉型。顯然，「衝擊—回應」理論的前提便是「中國歷史停滯論」：必須堅持認為中國社會一直處於停滯狀態，

缺乏內在的近代化動力，「衝擊—回應」的模型才有解釋力。然而，當宋王朝在 11—13 世紀打開近代化的大門時，費正清所說的「西方衝擊」在哪裡呢？

七

我們還需要解釋一個問題：既然早在 11—13 世紀的宋王朝，中國就已經產生了近代化，那為甚麼到了 19 世紀下半葉，中國的近代化轉型還會顯得那麼艱辛、一波三折？這麼重大的問題當然不適宜用單一的原因來解釋，不過如果要找出最深刻的歷史原因，我認為，那便是「唐宋變革」所代表的近代化進程在南宋滅亡之後被中斷了，歷史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倒退。

敏銳的明末思想家黃宗羲與王夫之都察覺到，宋朝的覆滅不可跟其他王朝的更迭相提並論。黃宗羲說：「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王夫之說：「二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宋朝之亡，不僅僅是一個王朝的覆滅，更是一次超越了一般性改朝換代的歷史性巨大變故。用那個時代的話語來說，叫作「亡天下」；用今天的話語來說，不妨稱為「文明的中斷」。

為甚麼說宋朝的滅亡是「文明的中斷」呢？請允許我先引用周良霄《元代史》序文中的一段話：宋亡之後，元王朝統一中國，並在政治社會領域帶來了某些落後的影響，「它們對宋代而言，實質上是一種逆轉。這種逆轉不單在元朝一代起作用，並且還作為一種歷史的因襲，為後來的明朝所繼承。……明代的政治

制度，基本上承襲元朝，而元朝的這一套制度則是蒙古與金制的拼湊。從嚴格的角度講，以北宋為代表的中原漢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滅亡，即陷於中斷」。

元王朝從草原帶入的制度及其影響，深刻地重塑了宋後中國的歷史。我們擇其大者，介紹如下——

「家產制」的回潮。本來宋人已有「天下為公」的政治自覺，就如一位宋臣告訴宋高宗：「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非君主私有，而為天下人共有。而來自草原的統治者則將他們所征服的土地、人口與財富都當成「黃金家族」的私產，推行中世紀式的「投下分封制」，「投下户」即草原貴族的屬民，有如魏晉至隋唐時代門閥世族的部曲農奴。

「家臣制」的興起。宋人相信君臣之間乃是一種公共關係：「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君臣之間，「各有職業，不可相侵」。入元之後，這種公共性的君臣關係被私人性的主奴關係代替，臣成了君之奴僕，許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宮服役。在主奴關係下，君對於臣，當然也是生殺予奪，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懲罰自己的奴隸，一位明朝的觀察者說：「三代以下待臣之禮，至勝國（元朝）極輕。」

「諸色戶計」的誕生。我們知道，宋代實行募兵制，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勞役亦不多見，差役也開始折錢結算。入元之後，征服者卻按草原舊制，推行全民當差服役的「諸色户計」制度：將全體居民按職業劃為民户、軍户、站户、匠户、鹽户、儒户、醫户、樂户等等，職業一經劃定，即不許更易，世代相承，並承擔相應的賦役。

「驅口制」的出現。宋朝基本上已廢除了奴隸制，但元朝征服者又從草原帶入「驅口」制度，使奴隸制死灰復燃。所謂「驅口」，意為「供驅使的人口」，即在戰爭中被俘虜之後被強迫為奴供人驅使的人口。元朝的宮廷、貴族、官府都佔有大批「驅口」，他們都是人身依附於官方或貴族私人的奴隸。

「匠籍制」的推行。宋朝的官營手工業多實行「和雇制」與「差雇制」，「和雇」是指從勞動力市場上招聘工匠，作為雇主的政府與工匠是平等且自由結合的雇傭關係；「差雇」則帶有強調徵調性質，但政府還是需要按市場價向工匠支付工資。元朝卻將全國工匠編入匠籍，強制他們以無償服役的方式到官營手工場勞動。

「路引制」的恢復。漢唐時，人民如果要出遠門，必須先向官方申請通行證，叫作「過所」。宋人則擁有遷徙之自由，不再需要甚麼「過所」。但元朝又實行「路引制」來限制人口的流動性，元會典中有一項立法，叫作「路人驗引放行」：「凡行路之人，先於見住處司縣官司具狀召保，給公憑，方許他處勾當。……經過關津渡口，驗此放行，經司縣呈押（原註：如無司縣，於尉司或巡檢呈押）；無公引者，並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户亦驗引，明附店歷。……違者，止理見發之家，笞二十七下。」商民出門遠行、投宿，必須持有官方開具的「文引」，類似於介紹信，才准許放行、住店。

「籍沒制」的氾濫。籍沒，即官府將罪犯的家屬、奴婢、財產沒收入官。秦漢時，籍沒制頗盛，但至宋代時，籍沒的刑罰已經很少適用，並嚴格控制適用，如宋孝宗的一項立法規定：「自今如有依法合行籍沒財產人，並須具情犯申提刑司審覆，得報，方許籍沒。仍令本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按劾以聞，許人户越

訴。」入元後，籍沒制度又氾濫起來，如忽必烈的一道詔書說：「凡有官守不勤於職者，勿問漢人、回回，皆論誅之，且沒其家。」這當然是財產權觀念發生退化的體現。

肉刑與酷刑的制度化。自漢文帝廢除肉刑之後，黥（刺面）、劓（割鼻）、刖（斬足）、宮（割勢）等肉刑已基本上不用，宋代承五代之舊，保留刺面之刑，但劓、刖、宮一直不敢恢復。元朝則將肉刑入律，如「盜牛馬者劓」。凌遲等慘烈的酷刑，在宋代只是法外刑，極少應用，在元朝則正式編入法典，代替絞刑成為元代死刑的兩種執行方式之一，凌遲開始氾濫化，致使中國法制出現野蠻化的趨勢。

「人殉制」的死灰復燃。人殉作為一種遠古的野蠻蒙昧風俗，在漢代以來的中原王朝已經基本消失，只有零星的自願殉葬。北方的契丹、女真等草原部族還存在著人殉之俗，這應該是社會未完全開化的體現。元朝貴族是否保留人殉，史無記載，但元廷鼓勵民間殉葬行為則是毫無疑義的，《元史》載：「大同李文實妻齊氏、河南閻遂妻楊氏、大都潘居敬妻陳氏、王成妻高氏以志節，順德馬奔妻胡閏奴、真定民妻周氏、冀寧民妻魏益紅以夫死自縊殉葬，並旌其門。」在這一惡俗中成長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即恢復人殉之制。

「海禁」的設立。中國的「海禁」之設，也是始於元朝。元廷統治中國不足百年，卻先後實行過四次「海禁」，「海禁」期間，商民不准出海貿易：「禁私販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半給告者」；海外商貿只能由官府出資的「官本船」壟斷。這一點，跟宋朝鼓勵和保護民間商船出海貿易大不一樣。

「宵禁」的重現。宋代之前的城市有「宵禁」之制，宋朝時「宵禁」制瓦解，出現了繁華的夜市。但元代又恢復了「宵禁」，入夜之後，禁鐘響起，即不准居民出行、飲宴、點燈，「看守之人，巡行街市，視察禁時以後，是否尚有燈火，如有某家燈火未熄，則留符記於門，翌晨傳屋主於法官所訊之，若無詞可藉，則處罰。若在夜間禁時以後，有人行街中，則加以拘捕，翌晨送至法庭」。

治理體系的粗鄙化。元廷君臣的文化層次跟宋人不可同日而語，這也導致元人無法繼承宋朝發達而繁密的治理體系，比如在法制領域，誠如民國法學學者徐道鄰先生所指出的：「元人入主中原之後，宋朝優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壞，他們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學，取消了刑法考試，取消了鞫讞分司和翻異移推的制度。」粗鄙治理體系的特點是稅率超低，政府只能維持最簡陋的形態，用孟子的話說，這叫作「貉道」；以現代的眼光審視，那種簡陋的政府根本無法在歷史轉型期組織社會與經濟的革新。

可以看出來，元朝征服者從草原帶入的制度具有明顯的中世紀色彩，它們的推行，意味著「唐宋變革」開啟的近代化方向發生了逆轉。

八

元制的殖入，不僅僅影響於元朝一代，而且改變了後面歷史的走勢。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由於嚴重缺乏立國者的創制智慧，幾乎全盤繼承了元朝的家產制（分封制）、家臣制、廷杖制、諸色户計、匠籍制、路引制、籍沒制、肉刑與酷刑制度、人殉制、

海禁制、宵禁制、粗糙的治理技術等制度遺產。

更要命的是，元制中保留下來的具有近代性的表現，卻被朱元璋堅決扔掉，比如重商主義的政策、對外開放的格局與寬縱的統治。

朱元璋似乎下定決心要將中國改造成為一個封閉而寧靜的巨型農村，人民待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得擅自離鄉離土，這個寧靜的秩序不歡迎流動的商人、喧嘩的商業，不需要太大的市場與太多的貨幣，人們基本上自給自足，即便有零星交易，也採取以物易物的方式。國家的賦稅也以實物稅與勞役為主，連衙門辦公的「文具紙張，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樣零星雜碎地向村民徵取」（黃仁宇語）。

至於開放的海岸線與嘈雜的海上商貿，更是不可容忍的，朱皇帝大手一揮，「寸板不許下海！」宋元時期負責管理海外貿易的市舶司，也被朱元璋改造成「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的機構，即接待海外朝貢使團，同時查禁海賈的國家機關。

元廷因為統治技術粗糙，表現出寬縱的特點。朱元璋說：「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他當上皇帝後，果然剛猛苛嚴，說禁海就禁海，說不許開礦就不得開礦，說廷杖就廷杖，說死罪就死罪。因而，朱元璋時代對於政治、社會、經濟諸方面的控制，比宋元都要嚴厲得多。

明王朝的悲劇便是，它必須不斷突破朱元璋設定的「洪武型體制」，才可能艱難地回歸到「唐宋變革」的近代化軌道上來。到了晚明，隨著匠籍制與諸色户計的鬆懈、月港的開放、海外巨量白銀的流入以及「一條鞭法」的推行，「洪武型體制」才宣告解體，繁華的工商業終於脫困而出。一些歷史學者相信這一段時

期出現了所謂的「晚明資本主義萌芽」。

可惜，此時距明室傾覆已經為時不遠了。清人入關，中世紀制度又出現回潮：

社會經濟層面：清初恢復了嚴厲的海禁，強行將沿海居民內遷五十里；後海禁雖開，但乾隆又改「四口通商」為「單口通商」，又拒絕英國馬戛爾尼使團的通商要求；從草原帶入奴隸制，「聽民人投充旗下為奴」;禁止或限制民間採礦，「一切銅銀坑俱封不開」。

文化生活層面：強行剃髮易冠，以此強化民間對朝廷的服從；大興「文字獄」；立碑嚴禁士子言事論政；大面積禁毀圖書，「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數之書，有一於家惟恐召禍，無問禁與不禁，往往拉雜摧燒之」，導致知識積累發生斷裂，士民思想陷於禁錮；經「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後，江南士風出現了嚴重的奴化。

政治制度層面：清王朝複製了朱元璋開創的體制，同時又將它改造得更加不堪：大清皇帝既是八旗子弟的主子，又是國家的元首，還是日理萬機的政府首腦。明朝式的皇權專制混合了草原式的主奴關係，致使整套體制顯得非常怪誕，也為清末新政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我們都知道，清末近代化轉型的目的，乃是建立君主立憲制下的「責任內閣」。但清朝體制跟君主立憲制的距離實在是太遙遠了，改造起來勢必要傷筋動骨，於是主政者拚命拖延，在野者則等得不耐煩，最後一拍兩散。

追究起來，這首先應歸咎於朱元璋廢除了宰相制度，皇帝直接當上政府首長，等於抽空了「責任內閣」的制度基礎。清制因之，設軍機處，作為皇帝機要秘書處。軍機處與近代「責任內

閣」的距離，甚至要遠於明代內閣與「責任內閣」的距離。若是放在宋朝的「共治」政體下，將宰相領導的政府轉換為「責任內閣」，我相信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從 19 世紀下半葉開始，一部分知識分子受了歐陸啟蒙主義思潮的感染，又極不滿清王朝應對近代轉型的低能，開始思考一個沉重的問題：為甚麼中國的近代化如此艱難？

但他們的思考不是從制度嬗變的角度抽絲剝繭，而是直接將炮口對準了中國的傳統文明，認為是中國人的傳統構成了近代轉型的路障，是傳統文化阻止了近代化。

這樣的「文化反思」至五四時期全面爆發，在「破四舊」運動中達到頂峰，餘緒綿延至 20 世紀 80 年代的「河殤」症候群。這些西化的知識分子跪拜在「中國歷史停滯論」的腳下。順乎邏輯地，他們主張以全盤摧毀傳統的極端激進方式建立「美麗新世界」。他們控訴傳統婚姻家庭，拆毀祠堂，抨擊宗族，砸爛孔家店，消滅士紳階層，挖掘孔子墓，焚燒儒家經書，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改造國民性。

然而，他們設想中的「美麗新世界」直到最後，都未能建成。

震蕩的一百年過去，中國白了少年頭。「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是時候重新評估我們的傳統了，是時候重新發現我們的歷史了。

瓦舍勾欄

瓦舍勾欄

十二世紀的北宋有一位叫作張擇端的畫師，留下了一幅令人驚豔的《清明上河圖》長卷（《清明上河圖》有非常多摹本，本書提及的《清明上河圖》，除非有特別註明，均指張擇端版本）。與他同時代的還有一位作做孟元老的文人，留下了一冊《東京夢華錄》（南宋的《夢粱錄》、《武林舊事》、《都城紀勝》與《西湖老人繁勝錄》，均模仿《夢華錄》體例）。我們現在對張擇端和孟元老的身世、生平了解有限，但只要展開他們的作品，我們便可以真切感受到宋朝社會的現代氣息、市民氣味及繁華氣象：街道交錯縱橫，民居鱗次櫛比，商舖百肆雜陳，酒樓歌館遍設，招牌幡幌滿街，商旅雲集，車水馬龍。

要領略宋朝市井的繁勝，不妨先到城市中的瓦舍勾欄去看一看。《水滸傳》第一百十回，燕青帶著李逵潛入東京城觀賞元

宋代佚名《大儺圖》。大儺是流行於宋朝的一種祭神儀式，
同時也是市井間一項熱鬧的娛樂表演。

宵花燈，就是先到瓦舍看熱鬧的：「兩個手廝挽著，正投桑家瓦來。來到瓦子前，聽的勾欄內鑼響，李逵定要入去，燕青只得和他挨在人叢裡，聽的上面說平話。」

宋代的瓦舍，又稱瓦子、瓦市、瓦肆，是宋代城市的娛樂中心。瓦舍之內，設立勾欄、樂棚，勾欄中日夜表演雜劇及講史、傀儡戲、影戲、雜技等節目，當時名動一時的娛樂明星如丁仙現、王團子、張七聖等，也會到瓦舍演出。「瓦中又多有貨藥、賣卦、喝故衣（叫賣舊衣服）、探博（賭博）、飲食、剃剪、紙畫令曲之類」，煞是熱鬧。不管冬夏，無論風雨，瓦舍勾欄天天有演出，「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在這裡消遣時光，不知不覺一天就過去了，「終日居此，不覺抵暮」[1]。

東京城內有多少座瓦舍？《東京夢華錄》記錄了近十座，實際上肯定不止此數。當時規模最大的瓦舍，內設有「大小勾欄五十餘座」，而最大的勾欄「象棚」居然「可容數千人」，今日城市的劇場、體育館，容量也不過於此吧。

其他城市當然也設瓦舍勾欄，如周密的《武林舊事》記錄了南宋臨安有瓦舍二十三座。甚至小縣城、小市鎮也有勾欄，《水滸傳》中，鄆城縣那個勾搭閻婆惜的張文遠，「平昔只愛去三瓦兩舍」；花榮當知寨的清風鎮，「也有幾座小勾欄並茶坊酒肆，自不必說得」。如果說《水滸傳》是虛構的作品，那麼來看宋人筆記，沈平《烏青記》說，烏青有南北兩個瓦舍，北瓦舍係「妓館、戲劇上緊之處」，南瓦舍「有八仙店，技藝優於他處」，「樓八間，周遭欄楣，夜點紅紗梔子燈，鼓樂歌笑至三更乃罷」。

[1]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

勾欄是面向市民的商業演出場所，因此勾欄的表演通常都是收費的。收費分兩種方式，一是收門票，先購票再進入勾欄觀看節目，元曲《耍孩兒．莊家不識勾欄》就提到勾欄的門票制：「要了二百錢放過咱，入得門上個木坡。」另一種收費方式是，免費入場，但在表演之前會有專人向現場觀眾「討賞錢」，徐渭《南詞敘錄》記載說，「宋人凡勾欄未出，一老者先出，誇說大意，以求賞」。為了招徠觀眾，勾欄還會張掛「招子」，寫明演員名字與獻演節目，跟今日劇院貼海報做廣告沒有甚麼區別。

當然在瓦舍勾欄之外，也可以看到娛樂表演。宋朝有一類民間藝人，叫作「路岐人」，主要就在鬧市、路邊表演節目。《武林舊事》稱：「或有路岐不入勾欄，只在耍用寬闊處做場者，謂之『打野呵』。」南宋人耐得翁的《都城紀勝》載：臨安市井中，「執政府牆下空地，諸色路岐人，在此作場，尤內駢闐（熱鬧）。又皇城司馬道亦然。候潮門外殿司教場，夏月亦有絕伎作場。其他街市，如此空隙地段，多有作場之人。」《清明上河圖》就畫了這麼一個場景：街邊一個說書棚內，一群人正在津津有味地聽說書。

宋朝的城市也因此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靠商業性演出為生的藝人群體，被宋人稱為「趕趁人」，他們在城市各個熱鬧的地方表演節目：「吹彈、舞拍、雜劇、雜扮、撮弄（變戲法）、勝花（魔術）、泥丸、鼓板、投壺、花彈、蹴鞠、分茶、弄水、踏混木（雜技）、撥盆（雜技）、雜藝、散耍、謳唱、息器（樂器表演）、教水族飛禽、水傀儡、鬻水道術、煙火、起輪、走線、流星、水爆、風箏，不可指數，總謂之『趕趁人』，蓋耳目不暇給焉。」[1] 中國

[1] （宋）周密：《武林舊事》。

傳統社會的市民文化，是到了宋代才蓬蓬勃勃發展起來的，是從宋朝的瓦舍勾欄與市井間生長出來的。

酒樓

在《清明上河圖》中，酒樓、酒旗隨時可見，畫面最氣派的要算城內的「孫羊正店」，僅「彩樓歡門」——宋代的酒樓為招徠客人，通常用竹竿在店門口搭建門樓，圍以彩帛，這叫作「彩樓歡門」——就有三層樓高。《東京夢華錄》說：「在京正店七十二戶，此外不能遍數，其餘皆謂之腳店。」在宋代，所謂「正店」是指有釀酒權的豪華大酒樓；「腳店」則是一般酒樓，無釀酒權，用酒須從正店批發。

據《宋會要輯稿》，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朝廷下詔：「白礬樓酒店如有情願買撲出辦課利，令於在京腳店酒戶內撥定三千戶，每日於本店取酒沽賣。」意思是說，如有人承包白礬樓酒店的酒稅，朝廷可以將三千戶腳店劃為白礬樓的沽酒客戶。可見東京城內腳店數目之多，確實「不能遍數」。換言之，宋人對酒的消費量也是驚人的。宋人愛酒，稱酒為「天之美祿」，連女子也喜歡小飲幾杯。每一年，京城酒店用於釀酒的糯米就要消耗掉 30 萬石。

上面提到的白礬樓，又稱「樊樓」，是東京最有名氣的正店。據南宋人周密《齊東野語》的記載，白礬樓「乃京師酒肆之甲，飲徒常千餘人」。這等規模，放在今日，也稱得上豪華了。《東京夢華錄》也介紹了白礬樓：「白礬樓，後改為豐樂樓。

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上的「孫羊正店」，東京城內最繁華的大酒樓之一。

宣和間，更修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因為白礬樓太高，以致登上頂樓，便可以「下視禁中」，看到皇宮之內。這大概是亙古未有的事情。數百年後，清初詩人陳維崧遊歷開封，目睹開封的衰敗，不由想起北宋時汴京的繁華，心中感慨，便寫了一組《汴京懷古》詞，其中有對樊樓的描繪：「北宋樊樓，縹緲見彤窗繡柱。有多少州橋夜市，汴河遊女。一統京華饒節物，兩班文武排簫鼓。又墮釵鬥起落花風，飄紅雨。」

宋室南渡後，宋人在西湖旁重造了一座豐樂樓，是杭州城風光最秀美的酒樓，「據西湖之會，千峰連環，一碧萬頃，柳汀花塢，歷歷欄檻間，而遊橈畫舫，棹謳堤唱，往往會於樓下，為遊覽最」;「縉紳士人，鄉飲團拜，多集於此」[1]。杭州還有一座非常豪華的大酒樓——太和樓，一首宋代的題壁詩描繪說：「太和酒樓三百間，大槽晝夜聲潺潺。千夫承糟萬夫甕，有酒如海糟如山。……皇都春色滿錢塘，蘇小當壚酒倍香。席分珠履三千客，後列金釵十二行。」[2] 這太和樓竟有三百個包廂，每日可接待 VIP 客人三千名，酒樓雇傭了很多漂亮的歌妓待客，當壚賣酒的大堂經理就是一位「酒不醉人人自醉」的美豔歌妓（蘇小）。

這些大都市的酒樓，「不以風雨寒暑，白晝通夜，駢闐如此」，24 小時營業，不僅可以喝酒，還有歌妓陪酒：「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妝妓女數百，聚於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

[1] （宋）吳自牧：《夢粱錄》。
[2] （宋）佚名：《題太和樓壁》。

呼喚，望之宛若神仙」，有點像現在的「三陪小姐」；尋常酒肆中，「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來筵前歌唱，臨時以些小錢物贈之而去，謂之『札客』，亦謂之『打酒坐』」[1]。需要說明的是，這裡的歌妓，通常只是賣唱陪酒，並不賣身，南宋筆記《都城紀勝》說：「其他大酒店，娼妓只伴坐而已。」

高級的酒樓，都使用珍貴的銀器，「每樓各分小閣十餘，酒器悉用銀，以競華侈」。宋朝的京城人十分講究排場，請客喝酒習慣用銀器——「大抵都人風俗奢侈，度量稍寬，凡酒店中不問何人，止兩人對坐飲酒，亦須用注碗一副、盤盞兩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隻，即銀近百兩矣。雖一人獨飲，碗遂亦用銀盂之類，其果子菜蔬，無非精潔」[2]。確實奢侈。

茶坊

今天的小資們以喝咖啡為生活時尚，彷彿不到 Starbucks 喝咖啡，就不算了解現代都市生活的品質。一千年前的宋朝人，就跟現代人愛喝咖啡一樣愛飲茶。

大約從宋代開始，茶開始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日開門七件事」之一，「蓋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鹽醬醋茶」[3]。需要提醒的是，宋人的飲茶法，跟今人以開水沖泡茶葉的喝法不同，是將茶研成末，再以開水沖之，「碾茶為

[1]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
[2]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
[3] （宋）吳自牧：《夢粱錄》。

末，注之以湯，以筅擊拂」——這叫作「點茶」。日本的抹茶，即從宋朝點茶「山寨」過去的，日人《類聚名物考》承認，「茶道之起」，「由宋傳入」。宋人點茶，對茶末質量、水質、火候、茶具都非常講究。

因為對飲茶的熱愛，宋人形成了一套很有講究的茶藝，叫作「分茶」，是一種將「點茶」點出了新花樣的高超技藝。高明的分茶技術，能夠利用茶末與開水的反應，在茶碗中衝出各種栩栩如生的圖案。北宋《清異錄》記述，「近世有下湯運匕，別施妙訣，使茶紋水脈成物象者，禽獸、蟲魚、花草之屬纖巧如畫，但須臾就散滅。此茶之變也，時人謂之『茶百戲』」。這有點像今日咖啡店玩的花樣：利用咖啡與牛奶的顏色搭配，調配出有趣的圖案。據說著名的女詞人李清照便是一名茶藝高人，擅長「活火分茶」。

宋朝也流行「鬥茶」，即幾個熱愛茶道的朋友，聚於一起，分別煮水分茶，看誰的茶葉、茶水出眾，茶藝更高超。不僅士大夫中盛行鬥茶之風，平民也喜愛鬥茶。南宋畫家劉松年的《茗園賭市圖》，便非常傳神地描繪了市井間幾個茶販正在鬥茶的生動畫面。

因為市民愛飲茶，宋代城市中茶坊到處可見，就如今日的咖啡館。《東京夢華錄》說，汴京朱雀門外，「以南東西兩教坊，餘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南宋也一樣，吳自牧的《夢粱錄》記載，臨安「處處各有茶坊」，如俞七郎茶坊、朱骷髏茶坊、郭四郎茶坊、張七相干茶坊、黃尖嘴蹴球茶坊、一窟鬼茶坊、大街車兒茶肆、蔣檢閱茶肆。茶坊的名字都起得很酷，很吸引眼球，很有廣告效應。

茶坊構成宋代城市社會的公共空間，而不僅僅是單純飲茶的私人場所。清雅的茶坊是士大夫「期朋約友會聚之處」；高端的茶坊可供「富室子弟、諸司下直等人會聚，習學樂器，上教曲賺」;大眾茶坊則是「諸行借工賣伎人會聚行」的場所;還有「樓上專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的」,「非君子駐足之地也」[1]。

高檔的茶坊佈置得非常雅致,「汴京熟食店，張掛名畫，所以勾引觀者，留連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時花，掛名人畫，裝點店面……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頓奇松異檜等物於其上，裝飾店面」。今日一些咖啡館、酒吧、茶樓為顯示清雅、高貴，也喜愛掛名家的書畫作品。

還有一些茶坊搞特色經營，用歌妓招徠客人:「諸處茶肆、清樂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連三茶坊、連二茶坊，及金波橋等兩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歌妓）莫不靚妝迎門，爭妍賣笑，朝歌暮弦，搖蕩心目。凡初登門，則有提瓶獻茗者，雖杯茶亦犒數千，謂之『點花茶』。登樓甫飲一杯，則先與數貫，謂之『支酒』，然後呼喚提賣，隨意置宴。趕趁（買賣人）、祗應（服務員）、撲賣者亦皆紛至，浮費頗多。或欲更招他妓，則雖對街，亦呼肩輿而至，謂之『過街轎』。」[2]

這類高端茶坊，不論是品位，還是價位，都要比 Starbucks 高出幾個段位。宋人並不會因此而質問「為甚麼一杯茶湯賣得這麼貴」。顯然，高端茶坊賣的並不是茶湯，而是格調，是生活方式，是身份識別標準。

[1] （宋）吳自牧：《夢粱錄》。
[2] （宋）周密：《武林舊事》。

飯店

有人統計過，《東京夢華錄》共提到一百多家店舖，其中酒樓和各種飲食店佔了半數以上。《清明上河圖》描繪了一百餘棟樓宇房屋，其中可以明確認出是經營餐飲業的店舖有四五十棟，也差不多接近半數。南宋筆記《武林舊事》《都城紀勝》《夢粱錄》也收錄了一大堆臨安的飲食店與美食名單。

「每日交五更」，東京的「酒店多點燈燭沽賣（宵夜），每分不過二十文，並粥飯點心。亦間或有賣洗面水，煎點湯藥者，直至天明」。朱雀門外的州橋夜市，那些賣盤兔、旋炙豬皮肉、野鴨肉、滴酥水晶鱠、豬臟之類的飲食店，每天都營業到很晚，「直至三更」才打烊[1]。

宋代飯店層次多樣，既有滿足城市下層群體口腹之需的大排檔，「專賣家常飯食，如擸肉羹、骨頭羹、蹄子清羹、魚辣羹、雞羹、耍魚辣羹、豬大骨清羹、雜合羹、南北羹，兼賣蝴蝶麵、煎肉、大熬蝦等蝴蝶麵，及有煎肉、煎肝、凍魚、凍鯊、凍肉、煎鴨子、煎鱭魚、醋鯊等下飯。更有專賣血臟麵、齏肉菜麵、筍淘麵、素骨頭麵、麩筍素羹飯。又有賣菜羹飯店，兼賣煎豆腐、煎魚、煎鯊、燒菜、煎茄子，此等店肆乃下等人求食粗飽，往而市之矣」[2]。底層人也能夠從這裡找到物美價廉的飲食。

更有高端大氣上檔次的豪華飯店，「其門首，以枋木及花樣

[1]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
[2] （宋）吳自牧：《夢粱錄》。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的一家腳店，一名伙記正往誰家送外賣。

沓結縛如山棚，上掛半邊豬羊，一帶近裡門面窗牖，皆朱綠五彩裝飾，謂之『歡門』。每店各有廳院，東西廊廡，稱呼坐次」。這些飯店以豐盛的菜餚吸引食客，「不許一味有缺」，任顧客挑選：「客坐，則一人執箸紙，遍問坐客。都人侈縱，百端呼索，或熱或冷，或溫或整，或絕冷、精澆、膘澆之類，人人索喚不同……須臾，行菜者左手杈三碗、右臂自手至肩馱疊約二十碗，散下盡合各人呼索，不容差錯」[1]。意思是說，你一進飯店，

[1]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

馬上就有人招呼座位、寫菜，你想吃甚麼，隨便點，很快菜便上齊了。

飯店的服務也很周到，將顧客當上帝看待：「凡下酒羹湯，任意索喚，雖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過賣鐺頭（飯店廚師）記憶數十百品，不勞再四，傳喝如流，便即製造供應，不許少有違誤。酒未至，則先設看菜數碟，及舉杯則又換細菜，如此屢易，愈出愈奇。」[1]

飯店伙計若是服務不周，被客人投訴，則會受到店老闆叱責，或者被扣工資、炒魷魚，「一有差錯，坐客白之主人，必加叱罵，或罰工價，甚者逐之」[2]。

因為汴梁餐飲業發達，「處處擁門，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飲食。市井經紀之家，往往只於市店旋買飲食，不置家蔬」[3];臨安也一樣，「處處各有茶坊、酒肆、麵店、果子……油醬、食米、下飯魚肉、鯗臘等鋪。蓋經紀市井之家往往多於店舍，旋買見成飲食，此為快便耳」[4]。換言之，宋代都市的小白領、小商人，跟今日的城市白領一樣，都不習慣在家做飯，而是下館子或叫外賣。——沒錯，宋代飲食店已經開始提供「逐時施行索喚」「咄嗟可辦」的快餐、叫餐服務了。《清明上河圖》就畫了一個不知正往誰家送外賣的飯店伙計。

[1] （宋）周密：《武林舊事》。
[2]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
[3]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
[4] （宋）吳自牧：《夢粱錄》。

【鋪席】
【大相國寺】
【小商販】
【運河】

鋪席

展開《清明上河圖》，我們會看到，汴河沿岸，是一排店鋪，越靠近城市，越是繁華、人煙稠密，進入城門之後，更是商鋪林立，除了前面我們介紹過的酒樓茶舍、飯店客邸，還有小吃店、小攤、修車鋪、解庫（銀行）、書棚、香藥鋪、布帛鋪、醫館等等。另按《東京夢華錄》記述，汴梁宮城朱雀門外，「當街（賣）水飯、熬肉、乾脯」，是飲食一條街；馬行街北則是藥鋪醫館一條街，如「山水李家，口齒咽喉藥；石魚兒、班防禦、銀孩兒、柏郎中家，醫小兒；大鞋任家，產科」。最豪華的店鋪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

宋人將商店叫作「鋪席」。南宋時，杭州的繁華不減北宋汴京，人煙浩淼，鋪席如雲。《夢粱錄》說：「蓋杭城乃四方輻輳

之地，即與外郡不同。所以客販往來，旁午於道，曾無虛日。至於故楮羽毛，皆有鋪席發客，其他鋪可知矣。」即使像「故楮羽毛」的小物件，也有鋪席批發、售賣。

《夢粱錄》又說：「杭州城內外，戶口浩繁，州府廣闊，遇坊巷橋門及隱僻去處，俱有鋪席買賣。蓋人家每日不可闕者，柴米油鹽醬醋茶。或稍豐厚者，下飯羹湯，尤不可無。雖貧下之人，亦不可免。」所以米鋪與肉鋪，須臾不可或缺，「杭州人煙稠密，城內外不下數十萬戶，百十萬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諸司有該俸人外，細民所食，每日城內外不下一二千餘石，皆需之鋪家」，「杭城內外，肉鋪不知其幾，皆裝飾肉案，動器新麗。每日各鋪懸掛成邊豬，不下十餘邊」。

宋朝的鋪席每天很早就開張營業。北宋汴梁，「每日交五更，諸寺院行者打鐵牌子或木魚循門報曉」，「諸門橋市井已開」，「酒店多點燈燭沽賣，每分不過二十文，並粥飯點心。亦間或有賣洗面水，煎點湯茶藥者，直至天明」[1]。南宋臨安，「每日交四更，諸山寺觀已鳴鐘」，「御街鋪店，聞鐘而起，賣早市點心」，「又有浴堂門賣面湯者，有浮鋪早賣湯藥二陳湯，及調氣降氣並丸劑安養元氣者，有賣燒餅、蒸餅、糍糕、雪糕等點心者，以趕早市，直至飯前方罷。及諸行鋪席，皆往都處，侵晨行販」[2]。繁華而熱鬧的一天開始了。

[1]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
[2] （宋）吳自牧：《夢粱錄》。

大相國寺

說起汴梁的繁華，有一個地方是不可繞過的，那就是大相國寺。大相國寺是寺院，但「每月五次開放萬姓交易」，因此又是東京城最大的商業交易中心。宋人筆記《燕翼詒謀錄》說：「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於此。」

《東京夢華錄》則比較詳細地記述了大相國寺「萬姓交易」的熱鬧場面：「大三門上皆是飛禽貓犬之類，珍禽奇獸，無所不有」，是一個寵物市場；「第二、三門皆動用什物，庭中設彩幕露屋義鋪，賣鋪合、簟席、屏幃、洗漱、鞍轡、弓劍、時果、臘脯之類」，是日用百貨市場；近佛殿則銷售「孟家道冠、王道人蜜煎、趙文秀筆及潘谷墨」等，是個文化市場；「兩廊，皆諸寺師姑賣繡作、領抹、花朵、珠翠、頭面、生色銷金花樣、幞頭、帽子、特髻冠子、縧線之類」，賣的諸寺尼姑手工製作的工藝品；「殿後資聖門前，皆書籍、玩好、圖畫及諸路罷任官員土物香藥之類」，大致也是個文化市場；「後廊皆日者（占卜者）貨術、傳神之類」，買賣的則是占卜算卦之人的用品。

宋朝的文人學士最喜歡逛大相國寺了。李清照與趙明誠結婚後，小兩口就經常跑到大相國寺「淘寶」，樂而忘返。這段美好的時光成了李清照一生中最難忘的記憶，她後來寫文章回憶說：「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趙明誠）在太學，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宦，便有窮盡

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1]

大相國寺僧人的廚藝也非常高超，「每遇齋會，凡飲食茶果，動使器皿，雖三五百分，莫不咄嗟而辦」。大相國寺內還開有飯店，宋人張舜民《畫墁錄》「相國寺燒朱院」條記載，「舊日有僧惠明，善庖，炙豬肉尤佳。一頓五觔。楊大年與之往還，多率同舍具飧。一日大年曰：『爾為僧，遠近皆呼燒豬院，安乎？』惠明曰：『奈何？』大年曰：『不若呼燒朱院也。』都人亦自此改呼。」——這個小故事說的是，大相國寺的和尚惠明，廚藝高明，尤其擅長燒豬肉，以至得了一個「燒豬院」的花名。

於是我們看到，這座寺院不是傲世獨立，而是完全融入滾滾紅塵，成為宋朝汴梁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是拒絕世俗，而是從容地接納了世俗。也因此，當我想起宋朝的大相國寺時，不會覺得它是世外桃源，而是感受到它的人間煙火氣。也許，這正是大相國寺的魅力所在。

可惜在北宋滅後，汴梁為金人所佔，大相國寺的繁華不再。范成大曾在南宋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國，經過大相國寺，發現寺院已「傾檐缺吻，無復舊觀」，雖然開市交易的習俗還保留著，但「寺中雜貨，皆胡俗所需」，如「羊裘狼帽」之類，再無半點南朝的文化氣息。事實上，整個東京城都已經失去了昔日的繁榮：「舊京自城破後，創痍不復。煬王亮徙居燕山，始以為南都，獨崇飾宮闕，比舊加壯麗。民間荒殘自若，新城內大抵皆墟，至有犁為田處。舊城內麄布肆，皆苟活而已。四望時見樓閣崢嶸，皆舊宮觀寺宇，無不頹毀。」[2]

[1] （宋）李清照：《金石錄後序》。
[2] （宋）范成大：《攬轡錄》。

小商販

城市商品經濟的魅力，並不在於它製造了少數富商，而是因為城市商業可以吸納數量更加龐大的農業剩餘勞動力，創造無數的就業機會。人們湧入城市，藉助城市經濟之力，能夠輕而易舉地成為一名小商販，得以養家糊口。如「饒州市販細民魯四公，煮豬羊血為羹售人，以養妻子，日所得不能過二百錢」[1]。如果命運不錯，還有機會發家致富，改變命運。《夷堅志》記述了一個叫作王良佐的小商販，「居臨安觀橋下，初為細民，負擔販油。後家道小康，啟肆於門，稱王五郎」。

宋人稱小商販為「小經紀」。《東京夢華錄》的「諸色雜賣」條描述說，東京城的宅舍宮院之前，每日都有小經紀「就門賣羊肉、頭肚、腰子、白腸、鶉兔、魚蝦、退毛雞鴨、蛤蜊、螃蟹、辣爐、香藥果子」，或者「博賣冠梳、領抹、頭面、衣著、動使（日用器具）、銅鐵、器皿、衣箱、磁器之類」。還有一些小商販走街串巷，用「鼓樂」吸引「小兒婦女觀看」，叫賣一些糖果。東京城內的「後街或閒空處」，則「團轉蓋局屋，向背聚居，謂之『院子』，皆小民居止，每日賣蒸梨棗、黃糕麋、宿蒸餅、發牙豆之類」。

《武林舊事》「小經紀」條記錄的名目更加豐富了，有一百七十八種。我挑幾項比較有意思的轉述一下：有賣貓糧的，賣新聞報紙的，賣火柴的，也有賣假髮的，賣肥皂團的；還有洗衣店、寵物美容店、修皮鞋店、化妝品店、冰鎮飲料攤子。無

[1] （宋）洪邁：《夷堅志·支癸志》卷八。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汴京郊外的虹橋上，是一個熱鬧的河市。

數小商販在京城裡開設各類小商店，經營各種小商品或者提供生活小服務。許多我們現代才見識到的日用小商品，早已在宋代的城市出現了。

可以說，發達的城市經濟給了小商販維持生計的機會，但反過來說更加恰當：是無數的小商販創造了宋代城市的繁華與市井生活的煙火氣息。每一天，宋朝城市在叫賣聲中迎來日出——五更時分，小商販「趁朝賣藥及飲食者，吟叫百端」[1]；又

[1]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

是在叫賣聲中降下夜幕的——小商販「頂盤擔架賣市食，至三更不絕，冬月雖大雨雪，亦有夜市盤賣」[1]。如果沒有小商販，城市該多麼單調，多麼死氣沉沉！

一個宜人、宜居的城市，是不可能將小商販排斥在外的。展開《清明上河圖》，我們會看到開封城內外的街道、河市，到處都是架大遮陽傘、擺小貨攤或者推著「串車」叫賣的小商販。不用擔心城管會來驅逐他們，因為宋朝的街道司已經在東京街道的兩旁豎立了許多根「表木」，只要在表木連線之內，便可以自由擺攤。我們看《清明上河圖》的「河市」，在虹橋兩頭，就立有四根表木，橋上兩邊，小商販開設的攤位，都在表木的連線之內，中間留出通行的過道。這樣，既照顧了商販的生計，也不致妨礙公共交通。

運河

看過《清河上河圖》長卷的朋友應該會發現，宋人喜歡臨河開店，沿著河岸，商舖、酒樓、茶坊、邸店、瓦舍勾欄櫛比鱗次，連橋道兩邊也擺滿小攤，形成繁榮的街市，行人、商客、小販、腳夫、馬車擁擠於街道;入夜之後，市井間熱鬧仍不減白晝。

《東京夢華錄》這麼介紹汴梁的夜市：「自州橋南去，當街水飯、燻肉、乾脯……雞皮、腰腎、雞碎，每個不過十五文；……香糖果子、間道糖荔枝、越梅、紫蘇膏、金絲黨梅、

[1] （宋）吳自牧：《夢粱錄》。

香椿元，皆用梅紅匣兒盛貯；冬月，盤兔、旋炙豬皮肉、野鴨肉、滴酥水晶鱠、煎夾子、豬臟之類，直至龍津橋須腦子肉止，謂之雜嚼，直至三更。」州橋夜市之所以這麼喧鬧，是因為倉場建於這一帶，汴河上的貨船駛至州橋碼頭後，需要靠岸卸貨、倉儲，物資在這裡集散，人流也在這裡匯合。

汴河，流貫開封城的一條運河，與惠民河、金水河、廣濟河合稱「漕運四渠」。其中與大運河相接的汴河是最重要的漕運線，東南六路的物資通過大運河北上，再轉入汴水，可以直達京師。商船的通行、貨物的流通、客商的往返、人煙的匯聚，使得汴河沿岸成了東京最繁榮的地段。《清河上河圖》所繪的正是東京汴河一帶的繁華景象。

不獨東京的市井由於汴河而喧嘩起來，整條大運河沿線，也因為運河的通航運輸而形成餐飲、住宿、倉儲、搬運、商品交易、娛樂、腳力服務等市場，從而催生出無數市鎮。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訪問宋朝的日本僧人成尋，沿著大運河從泗州乘船前往汴梁，他的日記詳細記錄了沿河見到的繁華市鎮，如船至宋州，在大橋下停宿，成尋看到「大橋上並店家燈爐火千萬也，伎樂之聲遙聞之」;「辰時拽船從橋下過店家，買賣不可記盡」[1]。宋代這些商業性市鎮的格局，完全不同於傳統的行政性城市，行政性城市是國家構建出來的政治中心，市鎮則是民間自發生成的工商業中心、製造業中心和運輸中心。

運河兩岸的城市，如亳州、宋州、鄭州、青州、宿州、徐州、泗州、揚州、真州、常州、蘇州、秀州、越州、明州、

[1] ［日］成尋：《參天台五台山記》。

杭州，也因運河經濟的輻射力而形成繁盛的區域市場，八方輻輳，商旅雲集，人煙稠密。《宋史．地理志》收錄有近 50 個人口 10 萬以上的城市，其中位於運河沿線的有 15 個，差不多佔了三分之一。通過對宋朝商稅分佈的分析，也可以發現，以運河為代表的水運網絡對於宋代商業發展的重要性，如熙寧十年（1077）的商稅約有 800 萬貫，其中近 400 萬貫就集中在包括汴河、蔡河等運河在內的十二條河流沿線。

日本漢學家宮崎市定提出，中國的古代至中世，是「內陸中心」的時代；從宋代開始，變為「運河中心」的時代，「大運河的機能是交通運輸，所謂運河時代就是商業時代。事實上由中世進入近世後，中國的商業發展得面目一新」[1]。宋朝的立國者趙匡胤遷就於漕運便利的現實情勢，不得不定都於運河線上的汴梁，卻也在無意中順應了「運河中心」時代來臨的歷史大勢。

[1] ［日］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

青樓歌妓

《東京夢華錄》說，東京城中「別有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之萬數」。這裡的「燕館歌樓」，便是舊時的所謂「青樓」。又有人統計了一下，《東京夢華錄》共有 19 處提及汴梁城內外的娼樓妓館。宋朝的色情業是不必諱言的。不過有一點須注意，古時青樓並不等於「紅燈區」，妓也不等於性工作者，訓詁學著作對「妓」的註解都是指「女樂」，換言之，妓提供的服務是音樂、歌舞、曲藝，而不是皮肉。當然提供性服務的妓也有，但一般品質低下，大多數的妓是「賣藝不賣身」的。

據宋人筆記《醉翁談錄》的記述，東京的妓女分為三等，上等歌妓「居處皆堂宇寬靜，各有三四廳事，前後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經右史，小室垂簾，茵塌帷幌之類」;諸妓「多能文詞，善談吐，亦平衡人物，應對有度」; 來訪的新進士及膏

梁子弟「僕馬繁盛，宴遊崇侈」。次等歌妓也是色藝雙全，「絲竹管弦，豔歌妙舞，咸精其能」，常應邀到富貴人家的宴席上，或京城的高級勾欄中表演節目，「求歡之者，皆五陵年少及豪貴子弟，就中有妖豔入眼者，俟散，訪其家而宴集焉」。下等歌妓則多散居在城北「循牆一曲」，色藝略差。

宋代有官妓，入樂籍，其任務是在政府的公務接待宴席上歌舞助酒，法律並不允許這些官妓提供色情服務：「宋時閫帥、郡守等官雖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1] 如果官員在公務接待之外「預妓樂宴會」，要處以「杖八十」的刑責。也就是說，官妓的義務是應公務接待之需，在宴席上唱唱歌、跳跳舞、彈彈琴，以助酒興，並不包括性服務；官員的權力，也只是在公宴上叫來妓樂助興，非公務性聚宴是不准召妓的，否則要打八十大板，甚至可能被罷官。

官妓的另一項工作是在官營酒店中「坐台」招徠生意。《東京夢華錄》記載：「凡京師酒店，門首皆縛彩樓歡門。唯任店入其門，一直主廊約百餘步，南北天井兩廊皆小閣子。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妝妓女數百，聚於主廊慊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

南宋繼續保持這一習俗，周密的《武林舊事》說，臨安的酒庫（即官營大酒店）「每庫設官妓數十人，各有金銀酒器千兩，以供飲客之用。每庫有祗直者數人，名曰『下番』。飲客登樓，則以名牌點喚侑樽，謂之『點花牌』。元夕諸妓皆並番互移他庫。夜賣各戴杏花冠兒，危坐花架。然名娼皆深藏邃閣，未易招呼」。

[1]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一。

吳自牧《夢粱錄》也寫道：臨安「諸酒庫設法賣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數內，揀擇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臉櫻唇，玉指纖纖，秋波滴溜，歌喉婉轉，道得字真韻正，令人側耳聽之不厭」。

甚至南宋市民的婚嫁儀式，也會雇請歌妓慶賀。男方迎婚時，「顧借官私妓女乘馬，及和倩樂官鼓吹，引迎花檐子或粽檐子藤轎，前往女家，迎取新人……迎至男家門首，時辰將正，樂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詩詞，攔門求利市錢紅。……方請新人下車，一妓女倒朝車行捧鏡，又以數妓女執蓮炬花燭，導前迎引」。可見在宋人生活中，「妓女」並不是一個受歧視的群體。妓女還是宋朝女性時尚的引領者，有一款在北宋女子中很流行的「旋裙」，就是由妓女帶動的：番俗，「婦人不服寬褲與襜制旋裙，必前後開胯，以便乘驢。其風聞於都下妓女，而士人家反慕效之，曾不知恥」[1]。這款「旋裙」前後開衩，方便騎驢騎馬，很受仕女歡迎。

當然也有一部分等而下之的妓女會從事色情營生，《都城紀勝》記載，有一些酒店，「謂有娼妓在內，可以就歡，而於酒閣內暗藏臥床也。門首紅梔子燈上，不以晴雨，必用箬贛蓋之，以為記認」，這個用箬贛蓋著的「紅梔子燈」，就是色情酒店的標誌，有點像今日西方城市的「紅燈區」。至於不掛「紅梔子燈」的酒店，妓女只是陪坐陪喝而已。

[1]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

後　記

我十多年前讀黃仁宇的書，看到黃氏說：「公元 960 年宋代興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貨幣之流通，較前普及。火藥之發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針，天文時鐘，鼓風爐，水力紡織機，船隻使用不漏水艙壁等，都於宋代出現。」當時並無特別的感觸，一翻而過。

後來檢閱宋代史料與關於宋史的研究著作漸多，才突然想起黃仁宇的這段話，油然感慨宋朝「好像進入了現代」。也因為心中有了這感觸，我忍不住在微博上發了一系列介紹宋朝「現代性」的歷史細節。比如宋代開封的城市白領不在家中做飯，而是「叫外賣」；比如《清明上河圖》展示的酒店業「燈箱廣告」；比如南宋杭州出現的「貓糧專賣店」；比如宋代大城市的「證券交易所」；比如誕生於宋代的紙幣；比如宋朝高度發達的契約；比如宋代立法的「民主審議程序」；比如非常縝密的宋代司法程序；比如十分講求分權制衡的權力構造……這些歷史細節組合起來，便展現出一種非常「現代化」的宋朝社會景象，讓生活於現代社

會的我們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微博發出後，許多朋友都覺得有意思，說與他們想像中的「宋朝」不一樣。其實我所說的宋朝細節，對於宋史研究者來說，不過是平淡無奇的常識。只是大眾未必閱讀過多少宋史研究的專著，又囿於宋代「積貧積弱」「封建專制」的成見，所以無法想像宋朝歷史的豐富性。

也有一些朋友對我說，你不如寫一本重新評介宋代的書吧，也好扭轉現在人們對宋朝的成見。「扭轉成見」云云，我不敢妄想，但換一個視角來重新觀察宋朝，發現宋朝，並與朋友們分享「重新發現」的一點個人心得，倒是我所願。

於是便有了這本書。

我以前出的書，基本上都是由報章雜誌發表過的文章整理集合而成。唯這一本，是專門為展現宋朝社會的「現代性」而用了兩年時間系統地「梳爬」出來的。文字分為四卷，分別從生活、社會、經濟與法政四個角度展示宋代的文明成就。我又從宋畫中精心挑選了近百幅（包括宋畫局部）作為插圖，以讓我們可以更加真切地感受宋朝文明。

「文明」，這是宋朝最令我著迷的地方。曾有朋友問道，你為甚麼總是這麼喜愛宋朝？這個問題我思考了很久。我想我的答案應該就是「文明」二字。宋朝武功顯然不如漢唐之盛時，但文明卻達至歷朝歷代之頂峰。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宋代文明中，已經呈現出豐富的「現代性」，並深刻影響了歐洲的文明發展。現在流傳頗廣的所謂「中國歷史停滯論」「衝擊—回應論」，不過是基於「西方中心論」的偏見。希望有機會讀到

這本書的朋友，能夠拋卻這種偏見，發現「宋朝—中國歷史—傳統文化」的另一面。

寫這本書，我不敢說批閱了多麼巨量的史料，但自認為參考了非常多的學界專家的研究成果。我想寫的並不是顧影自憐的學術文章——宋朝的文明需要讓更多的人看到；但我也不希望將文章寫成「× 朝那些事兒」這樣的文化快餐。我更願意以做學問的態度，來寫更有可讀性的文字。書中或有「驚人之論」，但這些論點，都有史料支持，而非「故作驚人語」。當然，最後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成品，是否達到「做學問」的要求，評判權在讀者。因學識所限，書中難免有大量錯漏，還望讀者諸君不吝於指正。

寫《大宋帝國三百年》的學者金綱先生曾經評說他的大著：「期待能有朋友挑出硬傷！哥必公開致謝致歉，並自糾正。但書中所有史識、史見、史論，即使有自認入木三分之批評，哥也不改！蓋哥之治史自有根脈，不容移易是也！」我想將金先生的這句話抄下來，以作自我表白。

這本書能夠這麼快擺到讀者面前，要感謝出版社的玉成，感謝范新先生與「新民說」諸位編輯的辛苦勞動，也感謝所有在學識上給了我有益啟迪的前輩學人、同道師友，感謝微博上一直關注我言論的粉絲與網友。

我寫作這本小書，有我太太與孩子歡樂相陪，並得到她們的鼓勵與支持。本書獻給她們。